

JUXUN YANJIU

4

1983

臺無計此神矢風雨

如磐石周故遠寄意寒

星不寐以我區區

魯迅研究

軒轅
二十歲時
二十一歲時

鲁迅研究

(双 月 刊)

1983年第4期目录



短评

- 关于宏观地研究鲁迅的几点设想……………秦家琪 (3)

论文

- 读《阿Q正传》札记……………严家炎 (7)
- 论《出关》和《起死》……………林 非 (24)
- 鲁迅与现代主义……………洪永平 (40)
- 鲁迅和川岛……………袁良骏 (57)
- 关于“五四”新文学社团的一些思考 (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刘增人 (65)
- 试论关于“鲁迅风”的论争……………王欣荣 (74)
- 孙冶方在“孤岛”时期参与了
“鲁迅风”问题的论争……………陈梦熊 (88)
- 评鲁迅短篇小说《药》……………徐 健 (93)

作家谈鲁迅

-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鲁迅对我从事科学文艺创作的影响)……………叶永烈 (110)
- 最主要之点 (创作目标与艺术才华)……………苏 晨 (118)

作品欣赏

- 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读鲁迅的《忆韦素园君》） 北京景山学校 龚肇兰 (127)
-

学人采访

- 王瑶访问记 高鸣鸾 (134)
-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 《鲁迅的精神》教学研究 北京广渠门中学 孔繁燧 (142)
-

鲁迅与当代青年

- 青年学生热爱鲁迅（湘潭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学习鲁迅的情况） 华济时 (149)
- “鲁迅研究”课堂讨论纪要 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 (152)
-

青年园地

-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及其文学 沈 栖 (158)
- 阿Q与传统文化、心理 林 岗 (168)
-

史料

- 关于鲁迅在日本仙台的六幅照片 江小蕙 (174)
- 何家槐谈鲁迅的杂文 (181)
-

书评

- 读《鲁迅史实新探》 马蹄疾 (183)
- 关于《且介亭杂文末编》的编排问题 刘善良 (188)
-

鲁迅研究

(双 月 刊)

1983年第4期目录



短评

关于宏观地研究鲁迅的几点设想……………秦家琪 (3)

论文

读《阿Q正传》札记……………严家炎 (7)

论《出关》和《起死》……………林 非 (24)

鲁迅与现代主义……………洪永平 (40)

鲁迅和川岛……………袁良骏 (57)

关于“五四”新文学社团的一些思考 (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刘增人 (65)

试论关于“鲁迅风”的论争……………王欣荣 (74)

孙冶方在“孤岛”时期参与了

“鲁迅风”问题的论争……………陈梦熊 (88)

评鲁迅短篇小说《药》……………徐 健 (93)

作家谈鲁迅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鲁迅对我从事科学文艺创作的影响)……………叶永烈 (110)

最主要之点 (创作目标与艺术才华)……………苏 晨 (118)

作品欣赏

- 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读鲁迅的《忆韦素园君》）……………北京景山学校龚肇兰（127）
-

学人采访

- 王瑶访问记……………高鸣鸾（134）
-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 《鲁迅的精神》教学研究……………北京广渠门中学孔繁煜（142）
-

鲁迅与当代青年

- 青年学生热爱鲁迅（湘潭大学中文系部分学生学习鲁迅的情况）……………华济时（149）
“鲁迅研究”课堂讨论纪要……………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152）
-

青年园地

-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及其文学……………沈 栖（158）
阿Q与传统文化、心理……………林 岗（168）
-

史料

- 关于鲁迅在日本仙台的六幅照片……………江小蕙（174）
何家槐谈鲁迅的杂文……………（181）
-

书评

- 读《鲁迅史实新探》……………马蹄疾（183）
关于《且介亭杂文末编》的编排问题……………刘善良（188）
-

关于宏观地研究鲁迅的几点设想

秦 家 琪

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应该具有哪些特色和达到何等水平，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我们的设想是，鲁迅研究必须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有新的突破，而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就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当前更需要从广度上见出深度。为此，运用宏观研究的方法（历史的、发展的、比较的和综合的）研究鲁迅，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子。

近年来，对鲁迅生平史实的考订，对鲁迅单篇著作和作品中个别形象的研究，对鲁迅世界观、美学观、艺术创作方法的研究等等，学术理论界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在更广阔的背景（时间与空间）上认识鲁迅，宣传鲁迅，把鲁迅的出现和存在作为一个规律性现象，从鲁迅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探索其所反映的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考察鲁迅的艺术经验对我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以及进一步探讨鲁迅与他同时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开拓。

今天，鲁迅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看来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鲁迅思想和创作进行个别的、孤立的研究上。是否可以树立三大目标（或者说解决三大课题）：

第一，从“鲁迅与世界”这一课题生发开去，将鲁迅放置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鲁迅当时的）之中，进行深入的、有说服力的比较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对鲁迅从外国文学中吸取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作出全面的考察。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资料性的收集和整理上，例如，鲁迅翻译、介绍了哪些外国的作家作品，各国翻译、介绍鲁迅作品的情况，以及鲁迅同哪些外国的作家学者有着友好往来等。这些属于国际文学“媒介”性质的研究固然是需要的，它为研究鲁迅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必要的资料，但是，这并不能从

实质上解决鲁迅的文学活动与世界文学的联系。重要的是要深入研究鲁迅的文学活动，在哪些方面和何种程度上使自己的创作（包括带动整个现代文学）脱离原先传统文学的封闭性体系而走向现代化，成为世界文学总潮流的一部分。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媒介研究”的水平上，也不能仅仅一般地、抽象地承认鲁迅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要多方面地深入发掘鲁迅所受外国文学的具体影响，从哲学社会思潮、文艺思想、文学流派、创作方法以及艺术表现手段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比较研究，实事求是地抉发其所受影响之所在。例如，对于鲁迅早期创作中是否存在象征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等外来思潮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似乎有悖于现实主义、革命民主主义而一概排斥于研究的视线之外。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关键在于研究它们是如何影响着鲁迅，而鲁迅又是怎样对待这些外来影响的。其次，要了解国外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往往满足于介绍世界各国翻译介绍鲁迅著作的情况，或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摘引国外学者研究中的个别观点（或褒或贬），而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国外学者由于他们各自社会的、阶级的、认识上的和方法上的差异，或者由于对鲁迅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缺少全面正确的了解，或者由于鲁迅著作翻译上的问题，在鲁迅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误解、错误甚至是反动的偏见，但也不乏足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深思和研究的宝贵见解。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它们都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推动我们扩大鲁迅研究的领域，为我们提供研究的新课题，增强我们研究鲁迅的责任感——让世界人民能公正地认识鲁迅。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宣传鲁迅对世界对人类作出的贡献。这样做，不是出于某些纪念活动或是礼节性的文化交流的需要，而是真正让全世界认识和承认鲁迅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与价值。

第二，突出“鲁迅与今天”这一命题，将鲁迅研究工作和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沟通起来。当前，继续阐发鲁迅的思想与革命精神，使之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加焕发异采，固然重要，但尤其需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总结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所提供的卓越的艺术经验，用来指导和推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就是说，应该将伟大的文学

家鲁迅，从研究者的书斋和大学的讲坛中解放出来，把鲁迅的无比丰富的艺术经验，交融、汇合于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去，丰富、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在“鲁迅与今天”这个课题下面，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是有关方面应广泛组织(通过采访、笔谈等形式)当代作家总结鲁迅遗产在他们走上文学道路之前(创作准备阶段)在文艺思想、创作方法、艺术个性等方面所给予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他们创作中所产生的作用、范围、深度和“变调”等情况。毫无疑问，鲁迅对于三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他的革命精神、战斗风格和现实主义传统，这已被许多作家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所证明，但是，鲁迅对于他们艺术创作活动的具体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总结。另一方面，鲁迅研究者不能拘囿于历史，而要将视野放大到当代的文学实践中去，关心、发现和分析当代作家创作中的鲁迅文学遗产的“光照”。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鲁迅的影响有时并不是直接的，自觉的，他所受前辈和国外的影响也不是单一性的，但是，鲁迅的影响可能通过潜移默化的形态，虽不自觉但却确凿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鲁迅与今天”的研究就在于“捕捉”这种影响的“光点”。例如，在高晓声的李顺大、陈奂生身上，人们不就看到了阿Q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某种“折光”吗？又如，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但鲁迅的杂文不还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杂文艺术中继续放射光芒吗？巴金慨叹他的《家》至今尚未失去其现实意义，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伤逝》等作品不也仍然具有现实的——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且同时是文学意义上的生命力吗？

第三，将鲁迅放回到他那时代的生动而丰富的文学背景中去，开展“鲁迅与同时代”的课题的研究。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手”、“盟主”、“主将”的地位，固然早已被确立，但“旗手”与队伍之间、“盟主”与盟员之间、“主将”与对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充分揭示。“鲁迅与同时代”的关系，在六十年代初，已被鲁迅研究工作者所重视，但不久就被迫中断了。现在，这个题目又被重新提到大家的面前，并已出了一批成果。但现有的一些文章(例如《鲁迅与×××》等)往往侧重于反映和介绍人物的关系，而从思

想、理论和艺术创作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和探讨的文章则比较少见，还远远不能反映出“鲁迅与同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鲁迅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成就高出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任何天才都离不开产生天才的土壤，鲁迅也不可能脱离他的同时代人。一个时代中人，总是在各种关系（同向与背向、统一与矛盾、协调与冲突等等）之中存在的，他们各自不同的，并且不断变化的意向、愿望、追求等等，便构成一个时代的倾向，时代的历史内容就是由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将鲁迅孤立、架空与“神化”的做法，都是在实质上对于鲁迅的“旗手”与“主将”作用的否定，因而是错误的。鲁迅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和同时代的作家（敌、我、友或左、中、右）的关系是复杂的、生动的、具体的；鲁迅的伟大，除了他本人的天才因素、社会历史条件外，离不开他从同辈人和同时代作家身上所获得的力量。即便是论敌、对手，他们对于激发鲁迅的聪明才智，培养和形成鲁迅的战斗性格，也都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所谓“鲁迅与同时代”的研究，就是要充分揭示鲁迅是怎样在历史的熔炉里，通过与同时代各种思潮、力量、事件和人物（特别是文艺领域中的）的矛盾与统一，交融与分裂的过程，不断地变化、发展而终于成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鲁迅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客观地探讨和“描绘”这个过程，并且科学地概括出规律性东西。只有这样，“历史的鲁迅”才能真正矗立在现代人的面前。鲁迅的生命，孕育于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鲁迅的生命，也因之永存。如果我们从鲁迅的脚下撤去历史的地基，给他穿上自己设计制造的现时代的外衣，实际上是扼杀了鲁迅的生命。还鲁迅以历史面貌，是真正的鲁迅研究。“鲁迅与同时代”这一课题，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三点，都是从宏观研究的要求出发所作的某些设想。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作宏观研究，将有助于在鲁迅研究工作上开阔思路，开拓新的领域。同时，宏观地研究鲁迅，还要求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便更有效地运用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的局部、细部等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将鲁迅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读《阿Q正传》札记

严 家 炎

一、“忧愤深广”的启蒙主义杰作

我们常常引鲁迅自己的话，称《狂人日记》为“忧愤深广”之作。其实，何止《狂人日记》一篇如此，同样的评语移用于《阿Q正传》甚至更为合适。只要读读作者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的序，我们就立刻会从字里行间感触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溢于言表的悲愤感情：“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这里包含着何等深沉的民族忧愤！如果说中华民族近代遭受的屈辱、歧视与忧患，使闻一多以《洗衣歌》庄严地表达一个古老民族的义愤和抗议，使郁达夫借《沉沦》来沉痛地发出一个“弱国子民”的控诉，使郭沫若写出《炉中煤》《凤凰涅槃》热切地表达民族新生的渴望，那么，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深沉的民族忧愤主要表现为对长期封建统治所带来的可怕后果的尖锐揭露尤其是国民愚昧、麻木状态的沉痛鞭打。无怪

乎当有人把《阿Q正传》看做“实在是在骂谁和谁”时，鲁迅说：“我只能悲愤”^①；当有人把《阿Q正传》说成是“冷嘲”时，鲁迅感叹而又不无讥讽地说：这种批评“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②；当有人认为鲁迅小说轻松诙谐近于左琴科时，鲁迅说：“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不及他的快活。”^③在一篇杂文中，鲁迅明确地说：创作《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④。这一切都说明，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心情，岂止如他自己所说的“孤寂”，实在是充满了痛苦和郁愤的！他心头正燃烧着一团灼热的火，一团要烧掉国民病态心理的火，一团要熔炼出新的国民精神的火，一团要热切地使自己民族得到新生以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火！一句话，这是民族自我批判的烈火。《阿Q正传》正是这样一篇“忧愤深广”的充满民族自我批判与自我期待精神的伟大作品。

《阿Q正传》大约是鲁迅小说中孕育时间最为长久的。如果把作者最初从生活中无意地受孕的阶段也算上，那么这篇小说的实际孕育时间也许同鲁迅考虑国民性问题的时间一样长。这个过程是作者眼见民族的危难、辛酸、血泪不断淤积，国民的愚昧、痛苦、麻木有增无已，因而经受着内心的长期煎熬与痛切思索的过程。一九三四年冬，当鲁迅译完西班牙作家北阿·巴罗哈的小说《促狭鬼莱哥羌台奇》时，他曾在附记中提到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

看完了这一篇，好象不过是巧妙的滑稽。但一想到在法国治下的荒僻的市镇里，这样的角色就是名人，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活，便可以立刻感到作者的悲凉的心绪。还记得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真和跋司珂的人们同声一叹。^⑤

这里记述的大概是鲁迅十三周岁那年寄居在皇甫庄大舅父家时的

-
- ① 《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 ②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③ 1935年4月4日致萧军信（此信附在3月25日致萧军信中）。
 - ④ 《伪自由书·再谈保留》。
 - ⑤ 《译文序跋集·〈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

亲身见闻。所谓摆“夜壶阵”者，是民间流传的刘永福用法术大破日本海军的故事（至今留存的清末藜庄旧主撰《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中还有《用夜壶阵舰烬灰飞》这样的图目）。试想：就在线吃了败仗，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不得不对日求和、割地赔款的情况下，后方村镇上，却居然还有人唾沫横飞，大讲什么刘大将军摆尿壶阵使日军“舰烬灰飞”的故事，而听的人也都为之“眉飞色舞”。两相对照，怎不使人感叹！这件愚昧而又虚妄的“精神胜利”的典型事例，给少年鲁迅印象那么深，以致四十年后还禁不住要重新提起。据许寿裳回忆，一九〇五年前后鲁迅在日本就已思考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可见那时他已有了大量的事实感触。到了辛亥革命失败，社会现实变得更加黑暗、混乱之后，鲁迅经历了多次失望的痛苦，郁积着更其深沉的民族忧愤，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便有了深刻的发展。他突出地鞭打了国民性中卑怯、势利、虚妄等思想顽症，还强调地反对了人们对“威福、子女、玉帛”一类的向往追求。他说：“中国人所蓄蕴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①他又说：“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②。这所谓“旧式的觉悟”，就是指自己解除压迫后却去压迫别人。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说：“中国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他甚至有这样的感慨：“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③在鲁迅看来，国民的思想如果还停留在老一套的“威福，子女，玉帛”上面，俄国十月革命便与中国人永远“不会相干”^④。他从眼面前那些“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的事实出发，得出了“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⑤的结论。稍后，他

① 《坟·杂忆》。

②③ 《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④ 《热风·“圣武”》。

⑤ 《集外集·渡河与引路》。

在一封信中追忆了自己认识的发展过程并把上述思想概括得更为明确：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很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①

这种主张自然具有唯心史观色彩，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并非出自凭空的冥思苦想，而是从生活出发，基于对历史事实的深刻观察，因而包含着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种从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深刻思想，一经与活生生的形象相结合，便降生了忧愤深广的启蒙主义杰作——《阿Q正传》。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阿Q正传》是民族忧愤的艺术结晶。

二、阿Q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如果把阿Q称做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流浪农民的典型，许多同志大概都会赞同。至今有争议的是：阿Q的思想性格，特别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究竟算是怎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象有些同志说的那样属于古已有之的人类普遍弱点，还是近代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所产生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作品本身已经作了回答：阿Q的充满矛盾的思想性格，主要是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过程中的产物。而未庄及其周围的社会，就是孕育阿Q这种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我们实在无须离开作品去探讨阿Q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① 《两地书·八》。

阿Q长期生活的未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它是一个极端闭塞落后，封建性很强，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多少变化的农村小镇；同时又是中国封建农村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下逐步破产然而还在拚命挣扎的一个缩影。

关于未庄及其周围的环境，有这样几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这里有森严的等级制度，高贵者可以任意欺压低贱者。赵太爷、钱太爷这类封建势力是主宰未庄生活的中心，他们的意志就是未庄人的法律，他们的行动就是未庄人的最大的新闻。小说第六章写道：“未庄老例，只有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其他人进城都算不得什么新闻。小说第三章提到阿Q被赵太爷打时写道：“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底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可见，赵太爷、钱太爷在这里是土皇帝。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进行极其贪婪的敲骨吸髓的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有权处置各种各样事情。他们不许阿Q姓赵，阿Q就不能姓赵；他们控告阿Q抢劫，阿Q就得被抓起来枪毙；一切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而且阿Q被枪毙连案卷都没有立过，可见无所谓法律，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封建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在这里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尽管清朝末年的浙东一带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比较活跃的地方，但封建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什么触动。什么“男女之大防”啦，什么“男尊女卑”啦，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啦，等等，这套封建信条支配着未庄群众的头脑。阿Q精神胜利法里有一条“儿子打老子”，大概是西方人根本不懂的。为什么老子就光荣，儿子就耻辱呢？它就是从“父为子纲”来的。这套封建信条，谁都违反不得。此外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老例”“通例”，以及各种旧的风俗习惯，也都是绝对不能违反的。不要说一般人违反不得，就是有钱有势的人违反了，也要受到莫大的非议。譬如钱家大少爷到国外留学，在外国剪掉了一条辫子，回到未庄就引起轩然大波，受到每个人的攻击。“他的母亲大哭

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这位钱大少爷，只好装了一条假辫子，然而在周围的人看来，“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第三，社会半殖民地化和农村经济破产的过程正在加速进行。未庄一方面极端闭塞，连传说革命党进城时都是“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似乎辛亥革命是为明朝恢复天下；另一方面，它的古老生活传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逐步深入，也不得不被迫缓慢地起着变化。不但人有从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就是所谓“假洋鬼子”），而且东西也有外国货。阿Q从城里偷回来卖的东西中，就有“洋纱衫”之类，这些东西还似乎很受未庄人的欢迎，可见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已经相当深入了。我们知道，中国人开头对外国货是排斥的、不信任的，但外国资本主义政府靠枪炮轰开了中国关闭着的大门，强迫中国人痛苦地发生变化。后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商品成本低，质量也高过于土法生产的东西，于是慢慢推销开了。中国人称这些东西为洋货，象煤油就叫做“洋油”，火柴就叫做“洋火”，机器纺的纱就叫做“洋纱”，机器织的布就叫做“洋布”，用外来布做的上衣就叫做“洋纱衫”，……如此等等，以区别中国原来的东西。所以，“洋纱衫”之类能够流传起来，许多人争着买，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已经有了一段历史。而伴随着这种经济入侵，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封建经济就受到破坏，加速破产，越来越萧条，象阿Q、王胡、小D这样失去土地的赤贫者就越来越多。有些就成为无业游民，流入城市。阿Q性格的一些方面正带有这种破产了的小生产者的特征。

第四，在未庄及其周围的环境里，市侩主义盛行。如果说，封建时代的农村生活还有它相对的淳朴的一面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市侩主义、从势利出发、一切着眼于势利的思想，这时就更加盛行，象传染病一样在许多人当中蔓延，人与人之间异常冷漠。称颂强者，蔑视弱者，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从小说

中我们看到，人们可以对小偷产生敬畏之心，而对于阿Q那种“不敢再偷的偷儿”反而看不起。尤其在一部分小市民群众中，没有是非感，没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心。小尼姑受欺侮，酒店里的人们兴高采烈，大声哄笑。阿Q因为说了一声自己姓赵就挨赵太爷的打，还被地保敲去了二百文酒钱，周围的人不但没有一个打抱不平的，反而责备阿Q，“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没有一点阶级弟兄之间的友爱心，只把别人的痛苦当作笑料来加以鉴赏。用鲁迅最沉痛的话来说，真是到了“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①的地步。一切都只是成了看热闹，无动于衷，看了不合理现象没有义愤，没有热血。阿Q被冤枉地抓起来游街、枪毙，对于这件事，人们的舆论、反应怎样呢？小说结尾时，作者含意深长地作了这样一段交代：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就是阿Q周围的环境。当阿Q临死前继续缺少觉悟，在游街过程中无师自通地说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的时候，人群里就爆发出狼嗥似的一片叫“好”的声音。当阿Q最后多少有点觉悟，感到周围那些“又钝又锋利”的眼睛象在“咬他”，使他感到“可怕”，想叫“救命”，因而再也不会唱戏的时候，周围的看客们就“不满足”了。应该说，这样的环境，就是产生阿Q思想性格（包括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温床。鲁迅是写出了产生阿Q性格的这种典型环境的，并不象成仿吾同志责备的那样，只注意写典型性格，不注意写典型环境^②。他不过把典型环境的描写溶化到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中去，没有孤立地、专门地去写而已。

①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② 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说：《呐喊》“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记述的世界，而在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作者的失败，也便是在此处。”